

## 植田谦吉与伪满协和会

沈燕

植田谦吉是日伪统治东北时期的日本关东军的司令官。日本关东军是一支驻扎在我国东北，用以维护日本殖民统治，屠杀中国人民的侵略军队。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扩大侵略战争，侵吞我国东北的急先锋，而且还是支撑伪满政权统治东北人民的武力后盾。这支侵略军的头目关东军司令官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总代表，是掌握伪满洲国的实际统治大权，实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主宰者、太上皇。

在日伪统治的14年期间，对关东军司令官这一至关重要的职务曾几易其人，先后计有7名“武功赫赫”的日本侵略军将领出任此职。1936年2月，日本国内发生了轰动世界的“二·二六”事件，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南次郎为处理善后事宜，于当年3月被调回国，植田谦吉则继任了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的特命全权大使。

植田谦吉，1897年生，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0期毕业后，历任骑兵少尉、骑兵监部员、陆军省军务局课员、参谋本部附、教育总监部附、航空本部长、朝鲜军司令官等职，1933年升为日本陆军大将。他矢志为天皇尽忠，不惜马革裹尸，疆场捐躯。为绝后顾之忧，从未娶妻，是个单身将军。曾任驻中国天津的日军司令官，洞悉中国情况。1932年日军发动上海事变时，他曾率部攻占上海，立下战功。虽然他在侵略战争中被打掉了一条腿，但他并没有醒悟，反而增长了侵略气焰，是一

个典型的战争狂。

基于此，植田谦吉被选任为关东军司令官，担负对中国东北这一日本帝国主义视为生命线的殖民统治的重任。

植田上任伊始，便进一步强化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重新制定与修改了一系列殖民统治的法令与政策。1933年8月，日本内阁曾通过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规定：“对满洲国的指导，是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通过日籍官吏实际实施”。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殖民统治的加深，植田认为还需进一步扩大和增强日籍官吏在伪满政权机构中的权势，突出其领导地位。于是，于1937年对伪满政府行政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组和调整，进一步加强了在关东军司令官直接掌握下的总务厅中心主义的体制，强化了总务厅的人事、行政等统治权，全面控制伪满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以适应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强化法西斯殖民统治的需要。由植田谦吉策划和控制的这次伪满行政机构改组所确定的格局，基本上延续到伪满后期。这次改组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则开始了大规模的经济掠夺和更加残酷的法西斯统治。

植田在对伪满行政机构进行改组与调整的同时，另一项重要的“政绩”，便是强化了伪满协和会的各项职能，使其更大程度地发挥其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的作用。

伪满协和会是在关东军一手支持下，以1932年4月成立的“满洲协和党”为基础，改“党”为“会”，于当年7月25日成立的反动政治团体。组成协和会的骨干人员大都是鼓噪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军国主义分子——满洲青年联盟盟员、大雄峰会会员和一些满铁社员。成立时，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名誉顾问，伪执政溥仪为名誉总裁，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为会长，

伪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为理事长，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伪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为名誉理事，并宣布与制定了协和会的创立宣言、纲领和章程。创立宣言宣称：成立协和会的目的在于“遵守建国精神”，“宣扬王道政治”，“实现民族协和”，以“强化国家的基础”。纲领规定：协和会“以实践王道为目的”，“谋求民族协和”，“振兴农业，改革产业，保障国民生存”。章程也规定：“本会以谋求振兴满洲国的建国精神和宣扬王道政治为宗旨”。这些规定归纳起来，大体包括三项内容：一曰“遵守建国精神”，实践“王道政治”，就是要将东北从中国本土分离出去，使之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称王称霸，主宰一切的独占殖民地；二曰“实现民族协和”，就是要贯彻实行由日本人作主人，其他民族当奴隶的民族压迫政策；三曰“振兴实业，保障民生”，就是要对我国东北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资源进行全面掠夺，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协和党与协和会成立后，曾配合关东军的讨伐，对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与民众进行镇压、迫害、欺骗宣传，并为关东军搜集情报，筹集物资，本身也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因1932年8月上任的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主张解散协和会，使协和会的发展受到了不小的影响，虽然由于多数殖民者反对，而未予以解散，但小矶国昭要求协和会以教化团体存在。到1934年2月，小矶国昭离任，协和会开始摆脱了困境，特别是当年9月的改组，又使协和会被承认为政治团体，并获得了较快的发展。

1936年3月，植田谦吉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后，在进一步强化各项殖民统治措施的同时，大力加强对协和会的“指导”与利用，相继进行了如下一系列的活动：

（一）1936年7月25日，正当协和会成立4周年之际，由植田主持策划，对协和会进行一次大改组。改组的目的是调整伪

满协和会与伪满政府之间的关系，以期解决两者官吏之间的隔阂与对立情绪。改组的内容是重新制定了协和会的纲领、章程及其工作方针。将“满洲国协和会”改称“满洲帝国协和会”，规定：协和会是“唯一永久的举国一致的实践组织”，“与政府表里一体”。它的任务是：“传扬建国精神，实现民族协和，振兴国民生活，彻底宣德达情，完成国民动员”。可见，纲领与章程已明确规定了协和会与伪满政府相互依存的平行关系，并较以前多增加了两项任务，即“彻底宣德达情”与“完成国民动员”。前者是说，要协和会把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功德”，彻底地灌输到东北各族人民群众之中，并把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等“下情”上达给殖民统治者，使之更能针对具体情况，加强对东北人民的法西斯统治；后者是说，协和会要采取各种软硬手段，欺骗与强制东北人民，使之行动起来为其扩大侵略战争效力。

这次改组，在机构和人事方面也有较大的变动。以中央本部为最高领导机关，设立中央本部委员会代替以前的理事会，并设立中央本部的咨询机关。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任会长，伪大同学院院长井上忠也任中央本部长。中央本部的事务机构设置总务、指导、企划、监察4部，除监察部长由和田劲留任外，其余部长都作了调换，分别由平岛敏夫、中野琥逸、半田敏治担任。此外，还在省设省本部，在伪首都及其他一些城市设市本部，将县旗的办事处改为县旗本部。

在协和会举行的创立4周年，“综合式典”会上，植田谦吉还宣读了由关东军为伪皇帝起草的《敕语》。宣布协和会“与政府内外相辅”的关系，提出协和会的一贯任务是倡导“建国精神”，巩固“日满两国精神一体之关系”，“发扬东方道德之真义”，鼓励协和会员在“民族协和”精神鼓舞下“一心一德，各

尽职安分”，为日本殖民统治者尽忠效力“誓此不渝”。

(二)1936年9月18日，植田谦吉又发表了《满洲帝国协和会之根本精神》的声明。这个声明进一步阐明了协和会这一政治团体的性质，突出了协和会的官办特点和反动作用。在声明中，植田给协和会下了如下的定义，即为“协和会系以其汲取不尽的建国精神训练国民，是为实现其理想之唯一的思想的教化的政治的实践组织体”。并对协和会同伪满政府的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即：“协和会并非政府的从属机关，或对立机关，实为政府精神之母体，政府乃是由建国精神即协和会精神为基础所组成之机关”。因此，“真正的协和会员，均应在政治上、思想上、经济上以建国精神，致力于全体国民之动员，以期王道政治的实现。”所谓“精神母体”即“建国精神”，植田把它解释为是“以实现日满一德一心，民族协和、王道乐土、道义世界为理想的天皇的圣意”。这就是说，植田已把协和会作为向东北人民灌输“天皇圣意”的反动舆论工具。同时，在声明中，植田又一再强调：“伪满政府是在建国精神即协和会精神上构成的机关”，因而，“其官吏必须是协和会精神的最高最热烈的体现者”。这就是说，伪满政府官吏应当成为“协和会精神”即“建国精神”的忠实信徒和自觉执行者。在这个声明中植田还宣称：“满洲国的政治是哲人的政治，关东军司令官是哲人，为天皇之代表”，用以显示关东军司令官的权威。

对植田声明中所阐述的伪满协和会与伪满政府之间的关系，当时的日本人曾做过如下的比喻，即：“满洲国是一件衣服，政府是面、协和会是里，相结合而成为一件夹衣”。伪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则说：“政府是老百姓的父亲，协和会是老百姓的母亲，二者像夫妻一样，在母爱之下，协和会便是一个爱护老百姓，给老百姓捞得实惠的唯一组织”。这表明了日本殖民者利用

协和会为虎作伥、欺骗与统治东北人民的本质。

(三) 植田还把“反苏反共”活动，列入协和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并将“排共运动”纳入协和会搞的“国民运动”的轨道上来进行。于是，在1936年12月，伪协和会为扑灭共产主义，分别于15日至20日间，相继在长春、沈阳、大连、哈尔滨、锦州、承德、安东、山海关等地召开“排共国民大会”，发表《反苏反共宣言》，声称：“现今世界陷入混乱”，其根源，实为“共产党之所起”，“满洲国民”应挺身而出“对国内共产主义之片言只句，亦务予驱逐，共产党纵最后一员，亦务予歼灭。”当此“盟邦日本与新兴德国已订反共协定，排击共产党之时机即将成熟”之秋，伪满协和会，应本着“兴亚大义”，“以期灭绝扰乱东亚和平之共产党。”

(四) 1937至1938年间，植田又对协和会进行一次改组。1937年4月，对协和会中央本部进行人员调整，调派曾任过伪满民政部总务司长的甘粕正彦出任协和会的总务部长兼企划部长(后总务部长由皆川丰治接任)，由伪满总务厅主计处长古海忠之兼任指导部长，只有监察部长仍为和田劲。5月，中央本部长井上忠也辞职，由汉奸于静远接任。8月，中央本部为统一协和会内部的认识，制定了新的会员规划以及分会组织规则。以前，协和会的会员分为普通会员、正式会员和赞助会员三种，对各种会员入会都有严格的规定。新的会员规则对会员放宽了要求，规定：“凡致力于完成本会目的，年满20岁以上，身心健康的满洲帝国人民，均可成为会员。”同时，还制定了分会组织规则，确定按居住或单位或工作场所都可作为一个地区而成立分会组织。这些规定使协和会的组织可以得到迅速发展，入会会员也可得以迅速增加。到1938年2月，协和会中央本部机构与人员又有新的变动，中央本部长由伪满参议府副议长桥本虎之

助充任；在中央本部下设企划局、总务部、实践部、辅导部和审查役室，各局部室头目均由伪满政府的现职官吏充任。其中总务部长为皆川丰治，企划局长为松木侠。此外，还对伪协和会的章程及中央本部规则作了部分修改。通过这次改组，使协和会加强了自身管理和思想统一，增强了反动职能。按照“协和会工作方针”规定，协和会的职能包括“精神、协和、厚生、宣德达情、组织、兴亚”等6项，实际上使协和会对日伪统治当局所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措施都给以积极配合，实现其“二位一体”。

(五) 植田还十分重视协和会的“联合协议会”制度的实行。联合协议会的组织以虚假民主的形式，几乎每年都在伪都新京举行。名义上是要强化协和会“宣德达情”的职能，实际上是将日伪统治下东北各地各族人民的不满动向等“下情”，及时向日伪当局“上达”，以便采取反动措施，强化法西斯统治；同时还可将日伪当局各项反动政策、措施，在“民族协和”、“振兴民生”、“兴亚”等名义下，向东北各族人民进行欺骗宣传。因此，植田在任期间经常列席协和会的全国联合协议会，予以“指导”。如1937年9月11日，在伪国务院会议室召开了一次“协和会全国联合协议会，到会的各省、市、县代表200余人，植田亲自到会，并发表了题为《宣体诏书意旨，更举协和之实》的训词，他就先为会员打气说，“查本会过去5年之实绩，其所趋向，内外明澈，近时会势顿振。会员之资质，盖见高涨，与政府之施政呼应，纳民心于道义，普及协和政治洵堪庆幸。此厥赖诸君能奉体诏书之旨，诚恳力行不倦所至，殊多辛劳矣。然而，现下内外时局，极至多事，亟需日益宣扬建国精神，呈现民族协和，多赖会员诸君之奋起。”随后，他话锋一转，又竭力为日军发动“七·七”事变，开展全面侵华战争进行辩解，开

脱罪责。最后，植田谈及要实现协和会之理想，在当今时局之下，更要“翼赞政教，安各民族于共荣，益使日满两国不可分关系巩固，不仅令友邦自享共信，尤作日满华三国提携协和之基石”。

植田不仅摇唇鼓舌喋喋不休地“显扬”协和运动，更重要的还要将其付之实际。如1938年春，协和会中央本部按照植田的旨意，向伪满各地协和会发出檄文，要求会员捐纳资金15万元，以购买命名为“满洲协和号”的飞机一架，以实际行动支持日军的“圣战”。结果，在各级协和会的强迫威胁下，在东北各地共摊派刮取资金达17万余元，由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桥本虎之助将此资金亲自交给植田谦吉，购买了一架240马力的伤病员运输机，并大造声势，举行了飞机捐献仪式。

经过上述的一系列改组、宣传、组织等活动，使协和会得以飞速发展，会员猛然增加。据日伪1938年11月末统计，计有省本部17个、市县地区本部123个，分会3200余个，会员113.7万余人，较1936年9月末时，增加了分会1300余个，增加会员69.8万余人。同时，协和会的反动活动也更加频繁、猖獗。不仅罪恶活动的数量不断增多，而罪恶活动的范围、规模也不断扩大。除密切配合日伪军警的讨伐“肃正”，残酷镇压与瓦解抗日武装，大肆进行反对共产主义活动；大搞反动舆论工作，腐蚀与毒害东北各族人民；极力组织“国民运动”，协助日伪统治机构，对东北人民实行残酷压榨、奴役和搜刮之外，还把奴役、腐蚀、毒害东北各族青少年作为协和会的主要工作之一。其目的是企图把东北各族青少年培养训练成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的顺民和任其宰割的奴隶。其手段有二，一是组成协和会统辖的青年团体，供其驱使，二是实行奴化训练，腐蚀与毒害青少年的思想。在植田出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于1937年3



月，即在原先一些青少年团和童子团的基础上，建立了协和青年团与少年团。1938年6月，伪协和会又发布“青年团组织大纲”，将东北各地的各种青少年团一律改称“协和青少年团”，并直接归协和会统管。此外，还在东北10余个较大城市成立了由20—35岁青壮年组成的协和义勇奉公队，作为协和会的外围组织，担任“警护”与“奉仕”两项任务，驱使他们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和掠夺而出力卖命。其协和义勇奉公队在1938年时已有19个，以后不断增加，到1942年6月时已增至75个。协和青少年团也不断增加，到1941年11月，已达1万余个，团员约为200万人。对青少年的奴化训练工作，自1937年后，协和会也非常重视。当年就在东北各地设立了48个青年训练所，受到奴化训练的青年达6000余人。翌年又增设了50个训练所，受训青年人数达15000余名。到1942年时，累计受训的青少年达8万余名。训练的课程分为军事课与公民课两种，其内容包括所谓“协和精神”、“法制”、“福利保健”、“产业”、“日语”等，旨在强制灌输所谓“建国思想”、“协和精神”。其手段为严酷的法西斯军营管理方法，通过对青少年的打骂、体罚、禁闭等等，来强制培养供日本殖民者驱使与宰割的奴隶与顺民。

总之，在东北沦陷14年期间，协和会的罪行罄竹难书，而在植田任关东军司令官期间，直接掌管和利用协和会，使协和会的罪恶活动尤为频繁与突出，并为他离职后协和会的进一步危害东北人民奠定了基础。东北人民把协和会称作“蝎虎会”，比喻协和会比蝎还毒，比虎还狠，正是协和会罪恶活动的真实反映。植田在任期间，还先后发动了张鼓峰、诺门罕两次对苏战事，均以失败告终，植田也于1939年9月被调回国。但历史将记载着植田谦吉操纵利用伪满协和会，加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扩大侵华战争等罪行。